

宁军医学校主任教官、国防部医务所少将军医主任。1950年，葆谦参加郑州市第二、第一医院小儿科的创建和领导工作，1960年任郑州市儿童医院院长，为小儿科疾病医治与研究作出很大贡献。

坡胡镇小李庄村人陈昕，1951年河南大学医学院毕业，曾任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外科副主任医师。长于泌尿外科。1955年作肾、膀胱、脾、胃切除手术，1980年主持用人工肾机抢救肾功能衰竭病人首例成功。又为三名肾动脉狭窄（肾性高压）患者施行自体肾移植成功。1981年6月独自为一慢性肾衰竭、尿毒症晚期移植异体肾成功，成为省内著名泌尿系统外科专家。

董村人邓爱民，1956年河南医学院毕业，长于骨科。1973年治疗肱骨上端巨细胞瘤时，用根治术成功地保留了上肢功能。著有《血源性基准化脓性骨髓炎140例临床分析》《中西医结合治疗骨关节结核》《骨脓肿44例临床分析》《良性软骨母细胞瘤》等。

大周镇五道口村人皇甫永穆，1958年武汉医学院毕业，调同济医科大学实验研究中心从事生物化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其学术论文有“动脉粥样硬化发病机制及其防治”“马王堆西汉女尸和江陵凤凰山168号西汉男尸组织DNA、RNA和脂质、维生素含量的分析”“合成食用油生物试验的研究”“胎儿质量预测——羊水胆碱酯酶、同二酶均一个梯度凝胶圆盘电泳在产前诊断畸形胎上的应用”等。后三项科研成果分别获卫生部科学奖和湖北省人民政府二等科学奖。

三、中西医结合

1956年，中医治疗乙型脑炎收效显著，组织西医学习中医基础理论。西医抢救危重病人，每每奏效，于是组织中医学习知识和疗法。1958年，全县医疗单位建立西医学习中医小组61个，145名西医医师（士）、133名护理员（占西医人数95%）学会用针灸治疗肚痛、牙痛等常见病。是年，县医院经中西医会诊，用针灸、大黄酒皮汤治愈阑尾炎3例。1959年，县医院中西医结合治疗患者350例，其中烧伤面积达84.6%的患者一例。

1974年，长葛县卫生学校，开办乡村医生和在职西医学习班，增设中医基础课；开办中医学习班，增设西医基础课。1976年6月，县人民医院建立中西医结合领导小组，三个月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65例，其中肠梗阻19例、消化道穿孔4例、胆道患者7例、阑尾患者35例（中转手术治疗9例），治愈率85%，无一例死亡。此外，还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乙型脑炎、脑膜炎，用中药排石汤治疗胆、肾、

膀胱结石，均取得成效。

1978年开始，县人民医院以西医主治医师吴甲戌、中医主治医师段怀庆为主，开展中西医结合治疗冠心病研究。以西医治标、中医治本，急则治标、缓则治本，标本兼治的原则，共收治冠心病患者31例，其中中西医结合治疗21例，全部治愈或好转。在临床中观察发现，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患者，病情稳定，康复迅速，远期疗效好，复发率低。而单纯西医治疗的10例，死亡1例，治愈9例，后有6例复发，其中4例一年中多次复发住院。

70年代，县人民医院选送优秀西医师6名，到中医学校进修，掌握中医诊断、治疗技术，同时组织中医学习西医西药知识，学会使用血压计、看检验单、X光片、超声波、心电图、脑电图、CT、B超等诊断技术。

第三节 常见病、地方病及其治疗

一、地方病

地甲病 1959年至1980年，四次普查普治，共查出患者475人，治愈50%以上。

大骨节病 1959年、1980年普查普治二次，查出患者150人，此病多系外来，经过治疗，大部痊愈。

克山病、克汀病 1980年进行普查普治，发现克山病5例，克汀病2例，均系外来，经治疗已痊愈或好转。

头癣 随查随治，1975年查出1083例，1980年查出1008例，1981年查出249例，1984年查出117例，经治疗90%以上痊愈。

氟中毒 1979年，在南席公社9个大队进行氟中毒和饮水含氟量调查，查出氟中毒7301人，发病率62.7%。1981年，对306所学校进行调查，查出氟中毒8652人，发病率为8.7%，接着对全县除老城、坡胡两公社以外的10个公社进行普查，共查出氟斑牙15528人，疑似氟骨症2人，发病率为37.29%。

二、传染病

霍乱 1952年开始接种霍乱疫苗，以后多年未发生疫情。

天花 新中国成立前不断流行，死亡率很高。民国30年，主善局始种牛痘。

1951年开始大量接种，控制了疫情，当年发病1例。1952年发病14例，全部治愈，以后绝迹。1982年停止接种。

白喉 疫情报告始于1951年，1954年开始注射白喉类毒素、百白破混合制剂，1970年后未再发生。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 1951年~1985年共发生4686例，死亡386例。其中1976年发病3217例，死亡168例。1979年改注射脑多醣体A群菌苗，降低了发病率。1985年发生22例，无死亡。

百日咳 1951年至1985年，除1961年外均有发生，1975年后稳定下降。开始注射百日咳疫苗，后注射百白破混合制剂。

斑疹伤寒 1951年发病9例，全部治愈，以后无发生。

回归热 1951年至1957年有人发病，1958年后无病例发生。

猩红热 1952年至1984年，偶有发生，1985年未再发生。

伤寒、副伤寒 民国时期不断流行，死亡率很高。1951年开始注射伤寒疫苗，除1962年发病933例，死亡2例外，以后发病率逐年下降。1985年接种伤寒四联疫苗。

病毒性肝炎 1960年始报疫情，1978年发病2107例，经过疗养，大部痊愈。

流行性乙型脑炎 1953年始报疫情，1976年发病309例，死亡39例。1978年开始接种乙脑疫苗。

疟疾 民国时期疟疾不断流行。1951年始报疫情，1964年发病41549例，死亡1例。除采用奎宁、氯喹、伯氨喹林、乙胺嘧啶等药物治疗、休治、复治外，还大力采取治脏灭蚊等综合措施，1982年以后，基本控制了疟疾的发生。

黑热病 民国时期不断流行。新中国成立后，仍有发生。1953年开始采用斯锑黑克针剂治疗，1954年后无死亡病例。1977年以来无病例发生。

1984年在石象村进行结核病调查，对15岁以上741人进行了胸透，占应透人数96.5%，确诊为肺结核18例。对15周岁以下1014人，作结核菌素试验，占应试验人数91.7%。其中阳性64人，阳性率占6.31%，同时，对阴性者全部接种了卡介苗。

三、常见病

长葛一带的常见病以感冒为主，一般病有肺病、肝病、肠胃病等，凡有此病者多到医院治疗，有利用中药治疗的，有汤剂和中成药，中医一般都是通过把脉、看

舌苔诊病，中草药回家自己熬制。这类病西医通过注射或口服西药治疗，唯有感冒被视为不重的常见病，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多用偏方或土法治疗。如大人感冒喝谷子（带皮的米）发汗，小孩用葱擦脚心或胸口用被子再蒙住头发汗。成年人咳嗽用蛤蟆皮草煎鸡蛋，或用本地槐枝用油炸后捞出，用油炒鸡蛋，或用红糖炒芝麻治疗，小孩酌量减少。

成年人常有腰腿疼病，多服用黑豆治疗。

70年代以后，随着医疗事业的发展，人们有病不论大人、小孩都到医院治疗，也有靠民间偏方诊治的。如肝病用大红枣煮白蒿，或者其他偏方治疗，这多是家庭困难或者是在医院治疗不好的重病、怪病才用民间偏方治疗。

第四节 中药材

长葛土质、气候，适宜多种药材生长。人工种植和野生药材有薏米、牵牛、红花、红娘、白芷、南星、白附子、荆芥、薄荷、小茴、麦冬、苏叶、车前子、瞿麦、地黄、菊花、白豆、赤小豆、天花粉、牛蒡子、莱菔子、百合、桔梗、丹皮、白芍、二花、首乌、大艾、竹叶、香附子、益母草、虫蛻、芮仁、斑毛、秦艽、枸杞、杏仁、桃仁、枣仁、苍耳子、桑葚、地丁、木则、芡实、柏子、牙皂、白毛根、腊梅、梔子、丁香、仙人掌、鸡冠花、豆根、蜂蜜、黄腊、韭菜子、大蒜、马齿苋、葶苈子、扁蓄、茵陈、石榴皮、槐米、花米壳、猪牛羊胆汁、驴狗肾、水蛭等70种。县医药公司又引进川芎、白术、元胡等。1985年普查，全县有人工种植中药材135种，野生中药材48种。其中尤以白芷、南星、薏米、白豆最为出名。民国4年长葛薏米、白豆参加巴拿马万国商品赛会，受到外国药商好评。

新中国成立后，长葛的中药材生产，几经周折、终有很大发展。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自由种植，到1953年对白芷、南星、白附子、薏米、苏叶、薄荷、白芥子等实行计划种植。1956年药材公司建立，加强中药材生产指导，1957年种植1332亩。1958年忽视多种经营，中药材生产下降，市场供应紧缺。1959年，投资4万元在增福庙公社簸箕杨大队办起中药培植场，种植白芷、南星、白附子、白芍、苏叶、薄荷、红花、菊花等400亩，收获药材3万余公斤。1962年实行奖售政策（每出售50公斤白芷，奖粮15公斤，化肥20公斤，布票3市尺），调高收购价格，药农得到实惠，1965年，全县药材种植面积猛增到2677亩，全年收购金额达88.4万元，仅白芷就收购577798公斤，除满足国内市场供应外，出口换汇7万元。1966年至1971

年中药材生产无人过问，奖售取消，价格降低，产量锐减。1972年，长葛医药公司恢复对药材生产的领导，并从四川、浙江请来川芎、白术栽培技术员各1人，使川芎、白术、元胡等急需药材，在长葛栽培成功。1978年后，药材生产有较快发展。1985年全县种植药材3843亩，其中白芷2500亩，收购22万公斤。但随着生产条件和自然环境的变化，有些传统药材减少。水磨河一带的荆三棱，曾是名牌俏货，北京同仁堂制药厂，常点名索购。后因湖中水位下降，已绝迹。董村牛脾山一带的地丁，李河口等村的牛子，石固梁庄一带的牙皂，每年均可收购数千斤，现已难以收到。全虫、蜈蚣、斑毛因大量使用农药，也已短缺。因药材收购价格不合理，挫伤药农积极性，如后河镇山孔、榆林一带山坡地多种小茄，每年可收数千斤，因收价太低，1975年以后，群众就不再种植了。1968年收购薄荷21万公斤，后降价每斤2角，收购量大为减少。野生药材苍耳子每斤5分，根本收不起来。

在长葛种植的主要中药材有以下几种。

长葛白芷 白芷为多年生草本伞形科植物，其根入药。始载于《神农本草经》，称芳草，列为中品。《吴普本草》称苻蒿、泽芬。《别录》称白芷。《夷坚志》称香白芷。明朝万历五年，李时珍把白芷编入《本草纲目》。

白芷分为兴安白芷、杭白芷、川白芷三大类。长葛白芷属兴安白芷，但与川白芷有亲缘关系。由于长葛白芷产于县境西部小洪河两岸，所处地理位置与自然条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所以质优效高，实属地道药材之冠，在国外享有崇高的声誉。1960年，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时期发生疾病流行，长葛的白芷曾大批运往越南医病防疫。

长葛白芷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始于16世纪20年代之前。清代及民国出版的《长葛县志》均有白芷记载。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中药志》记述：“禹白芷主要产于长葛及禹县。”197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药大辞典》记述：“白芷生产于河北者称祁白芷”，产于河南省称“会白芷”，亦叫“禹白芷”。

会白芷起源于明清。清代乾隆初年（1736）画匠王村药商乔金山引进试种成功，独家种植多年，到光绪末年（1908），该村种植面积已达七、八十亩，形成了初具规模的白芷栽培区。当时长葛区划为十二保，画匠王村属于尚友保会河管辖，故称“会白芷”。此后，在小洪河两岸多有种植，逐步发展到长葛县的后河、坡胡、石固、增福庙及禹县的郭连、古城一带，形成了地跨两县的白芷种植区域。由于流通渠道的演变，“会白芷”等中药材大量集中到“小禹州”交流，天长日久，又习惯称“会白芷”为“禹白芷”。

民国26年（1937），画匠王村药商胡永清去安徽亳州买卖药材，碰到一老药商

说：“在中药界对白芷评论有几句顺口溜你知道吗？”遂念道：“香白芷、白芷香，白芷出在洪河两岸上，菊花心、气芬芳，药到病除一扫光。”此乃是对“会白芷”质优效高的赞誉。但是，新中国成立前“会白芷”生产发展十分缓慢，加之官商药霸的欺压和剥削，药农收益甚微。当时社会上流传着：“白芷香，药农苦，一年到头忙碌碌，多了价低无人要，只好含泪喝糊涂（喝白芷汤）”的说法。所以，白芷种植面积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才发展到 100 多亩，总产量 25000 公斤左右。新中国成立后，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关怀下，白芷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20 世纪 80 年代，平均每年收购量为 115600 公斤，调出量为 112200 公斤。1960 年，由于自然灾害和“共产风”的影响，白芷生产也深受其害。

1965 年是长葛白芷生产形势最好的年份，收购量达到 579200 公斤，调出 57 万公斤，药农明显地增加了经济收入。1966 年“文革”开始后，又一次冲击了白芷生产，严重影响了药农的经济收入。1981 年至 1984 年间，市场紧缺，供不应求，价格猛涨，刺激了农民种白芷的积极性，加之市场开放、多渠道经营，致使种植面积失控，到 1985 年全境种植白芷达到 2000 亩，单产 250 ~ 500 公斤，总产量 80 万公斤，出现了生产过剩、价格猛跌、药贱伤农的局面，给国家和药农造成了一次较大的经济损失。当年，白芷因价格断崖式下降，被当地群众戏称为“黄金臭狗屎”，贵时如黄金，贱时如臭狗屎，无人问津。据村民加快，1981 ~ 1983 年，刚收获的白芷，未经加工、晾晒，每斤售价 8 元以上，到 1985 年，加工晾晒成干的白芷，每斤收购价只有 0.1 元。

长葛白芷的药用部分为其干燥根，形态类似圆锥形，无明显棱脊，个头整壮。质地坚实，呈黄白色，皮质细腻，粉足饱满，气味芳香浓郁，内呈菊花心花纹，是长葛白芷质量地道的独有特征。经江苏植物研究所鉴定，白芷含挥发油，根含呋喃香豆素：其中含比克白芷素百分之二；比克白芷醚百分之零点二；氧化前胡素、异欧前胡素、珊瑚菜素百分之零点零一五；还含有花椒毒素、紫花前胡昔元、脱水比克白芷东茛菪素及水合氧化前胡素等十多种有效化学成分。1987 年成都军区总医院和四川省计划生育研究所共同对白芷的化学成分进行了新的研究，分离出十三种香豆素，其中六种是前人从未发现的新成分，证实白芷是含香豆素最多的一种植物，为进一步开发利用白芷提供了科学依据。

长葛白芷具有抗菌作用，据体外初试对大肠杆菌、痢疾杆菌、伤寒副伤寒杆菌、绿脓杆菌、霍乱杆菌等均有一定的抵制作用。药性辛温，入肺、脾、胃三经。作用祛风、除湿、消肿、止痛，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医治头痛、眉棱骨痛、

牙齿痛、寒湿腹痛、鼻渊、肠风痔漏、赤白带下、痈疽疮疡皮肤瘙痒、疥疮等。白芷配伍可入许多处方。实践证明，用白芷、苏叶两味药治疗感冒，实属良药验方。用白芷和乌贼、牡蛎配伍，治疗妇女带下有绝妙之效。白芷也是一种植物类优质香料，广为酿酒、卷烟、食品、化妆品等工业所用。

长葛白芷质优效高，蕴藏丰富，老城以西6个乡镇的116个村庄，都曾经是白芷生产基地；且种植历史长，自然条件适宜，具有传统习惯及种植技术，基础扎实。但因价格浮动太大，1985年后已很少种植，药贱伤农的教训十分深刻。

天南星 天南星，系多年生草本植物，天南星的球状块茎供药，原名“虎掌”，是长葛传统地道的名贵中药材，有很高的药用价值，是我国药材出口商品之一。

《本草纲目》中，对天南星作过详细评述。《长葛县志》（清朝版）对天南星也作了记载。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为保证人民用药安全有效，《中国药典》历年版对天南星的来源、学名、历效、鉴别、质量标准等均作过详细论述和规定。这不但说明此药应用之久，而且在诸药中享有一定的地位。

天南星主要产区分布在石固、坡胡、后河三个乡镇。1965~1968年种植面积均达到800亩，年收购量在12万公斤左右，长葛历史上最高收购量达13万多公斤，外贸出口2万公斤。1990年后，已很少有人种植。

白附子 白附子，是长葛的地道中药材之一，是天南星科独角莲的干燥地根。秋季采挖，除去须根及外皮，用硫磺熏一至二次，晒干成药。

本品呈椭圆形或卵圆形，长2~5cm，直径1~3cm，表面白色至黄白色，略粗糙，有环纹及须根痕，顶端有茎痕或芽痕。质坚硬，断面白色，粉性。无臭，味淡，麻辣，刺舌。泡制方法：取净白附子，分开大小个，浸泡，每日换水一至三次，数日后如起粘沫，换水后加白矾（每100kg白附子，用白矾2kg），泡一日后再进行换水，至口尝微有麻舌感为度。将白附子取出后，再用生姜片，白矾粉置锅内加适量水，煮沸后倒入白附子，共煮至无干心，捞出，除去生姜片，晾到六至七成干，切成厚片即可药用。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记载，白附子味辛、性温有毒。归胃、肝经。有祛风痰，定惊、解毒、散结之功能。用于中风痰壅、口歪眼斜、语言涩謇、痰厥头痛、偏正头痛、喉痹咽痛、破伤风症、外治瘰疬痰核、毒蛇咬伤等症。

白附子主要产于长葛后河、和尚桥、老城和增福庙等乡镇。过去，因为白附子生产投工大、价格低、自由种植，所以收购量忽高忽低。但是，我县药农种植白附子历史悠久，栽培经验丰富，气候适宜，具有开发白附子生产的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第五节 药品经营

民国时期及其以往，药品由私人行店经营。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南席天宝堂中药店开业，经销业务甚大。新中国成立前夕，长葛共有中药店（铺）152家，多集中在老城、南席、石固、后河、会河、和尚桥等集镇上。此外还有许多游乡串村的药贩，他们除经营中药材外，还经营部分成药。如县城东街“益合成”药店，民国36年开始经营大圣丹、宝塔糖、何济公止痛散、唐拾义疟疾丸、万金油、哮喘丸和针剂盘尼西林、樟脑、六零六、片剂早发大安、磺胺、次苍、苏打片，以及体温计、注射针管、镊子、止血钳、手术剪等器械。1954年4月，益合成等药店联营组成“先进药店”，经营西药300余种，月营业额9000元。1956年10月转入供销合作社。同时，县城张玉、刘玉环等12人，联合成立公私合营药店、门市部2个，经营中西药品700种。南席、石固等集镇的中西医药人员，也都组成联合诊所或参加供销社经营。1953年12月，成立长葛县供销社医药经理部，1956年建立长葛县中药材公司，职工26人，下设石固、后河、和尚桥、县城、南席、洧川、韩佐等七个基层批发零售部。1980年4月建立长葛县医药管理局，1984年5月，恢复长葛县医药公司。至1985年底，有职工143人，其中干部26人，正式工87人，合同工30人。

1961年经营中西药品1419种，年销售额116.8万元，1985年经营中西药品、器械2014种，其中：中药材554种，中成药326种，西药850种，器械284种。年购进额349.1万元，其中收购药材29.3万元，中成药50.3万元，西药253.7万元，器械15.8万元。年销售额393.4万元，其中：中成药材42.7万元，中成药54.8万元，西药277.5万元，器械18.4万元。

第六节 巫医巫药

长葛一带的巫医在新中国成立前及新中国成立初期比较盛行，有神汉（下马子）神婆（下神）两种，神汉为多。1957年以后逐步减少，大都是在暗中活动。不论是新中国成立前及新中国成立初期或是现在，大都是有些病到医院请医生看后，吃药打针不见轻，被认为是“邪病”，即找巫医求治。另有一种情况是突发急病，病因不清楚，病状特殊，认为是怪病，也找巫医求治。还有的是小孩突然大哭不止，或者昏睡不醒，再有的是病发急症状奇怪，以为是“鬼说了”，或者是亡故后

的亲人来看孩子，使小孩生病，也要找巫医，驱鬼治病。

巫医本人敬的都有神，所敬的神都是在当地“显灵”，被人公认为“有法力”，能“消灾降福于民”的神，如“刘爷”“王爷”“关爷”“刘奶奶”“王奶奶”等，至于此神何种来路，法力如何，求医的人不知道，敬奉此神的巫医也未必能说清楚。

巫医看病时，求治者先说病情，然后巫医请求治者点香燃纸，并祷告，其词为家人有病，请“刘爷”“王爷”诊治。然后神汉、神婆便抹脸，长吁一口气，即说道：“‘刘爷’或‘王爷’来了”，边在嘴中含咒，念咒念的什么词、什么内容，求治者是听不清听不懂的。念过咒后，即用黄表纸折成椎形尖筒，在燃烧的纸香前来回晃动，纸筒里蜇下的碎粉即为神药，用纸包起来，让病人用水喝下即服了神药。有的是巫医说某某树上有仙家，都让病人到这里求药，病人家属便会带领病人到树下磕头烧香，同样是用纸折筒求药。若病好，便会在树上挂旗挂彩绸。

也有巫医称，有病人是鬼魂附身所致，而且鬼魂就在家中，神汉要画符，贴在藏鬼的地方，尔后挥起桃木剑，或真剑、刀驱之，神婆则是烧纸念咒驱鬼除邪。驱鬼时要打开大门屋门，以便鬼逃跑。驱鬼后，主人要给巫医封礼金。

病危的人或者老年人病重时，家里人为了办后事有准备，都要找巫医看“惯口”，即人死的日期。巫医要家里人说明病或者老人的生辰八字，以及得病、病重的日期，就算定其某月某日死，一般说一个准确的时间，另外再说一个大的时间空间，比如说：“初三去世，如果初三不死，就会在某月或大致几天的时间里死。”在肯定日期的同时，也留有很大的余地。

巫医是封建迷信，近几年虽然巫医仍有活动，但随着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已很少有人再信巫医，有病都会到医院诊治。

第七节 民间卫生习惯

一、家庭打扫卫生

一般是早晨起床后，先要用竹捆的大扫帚（新中国成立前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用家种的扫帚苗长老后砍下捆起来当扫帚）打扫卫生，夏天先洒水，后扫地，垃圾都扫到院内挖的沤制农家肥的粪坑内。院子是由男人（一般为家内的男掌柜起床打扫卫生后招呼家人上工干活），女人起床后用小笤帚（秫秆穗捆绑成）打扫屋内卫生。每天如此。如果是院内堆放什么东西，地上有杂物，可以不分男女随时打扫。

另外，家里要来客人，或逢喜庆的日子，要由妇女先打扫卫生，室内、室外均打扫干净，并用抹布擦洗桌椅。如果客人来后，发现屋内屋外有脏物再打扫，被视为对客人不敬，即有撵客的意思。

一年到尾，腊月二十三以前是要打扫厨房，所有的墙壁、屋顶都要打扫干净。但是大年初一扫下的垃圾不许往外扔，意为聚财，须到初五以后才可清理。

二、洗澡洗衣

每天早晨起来要洗脸，女人不洗脸不许进厨房做饭，男人不洗脸不许吃饭。用洗脸盆打上水（冬热夏凉），洗脸后再用毛巾擦干。晚上一般都用水洗脚后再睡觉。夏天男人到坑塘、河里洗澡，女人则在家关门闭户用水擦身子，擦身子时，用洗脚盆盛水。有的是先把水倒进洗脸盆，洗脸后再倒进洗脚盆擦身子。如果村里没有水坑、河，男人也要在家里用水冲洗身子，即站在木盆里，用水瓢舀起水在头顶往下倒着冲，然后用毛巾擦干身子。1990年以后，生活条件有了大改善，家里夏天洗澡用太阳能，冬天都到专业澡堂洗澡。

长葛一带新中国成立前及新中国成立初期洗衣服多用皂楠树结的皂角裹在湿衣服里用棒槌在捶布石上捶碎，然后浸泡在洗衣盆里洗衣服。也有用草木灰冲下的水碱澄清后用来洗衣服。家庭条件差的，就在清水里摆洗衣服。60年代以后用肥皂洗衣服，70年代以后开始用洗衣粉，如今虽仍用洗衣粉、肥皂洗衣服，但洗洁精、洗衣液已全面推广。新中国成立前后多用大瓦盆洗衣服，后用搪瓷盆，后用大铁盆、大铝盆，现在全部用洗衣机。

晒衣服时，女人的内衣不能挂在当院，小孩衣服和女人衣服要赶在天黑前收起，不能见星星。

三、饮食卫生

粮食要先拣而后磨，拣粮食时先用竹筛或小铁筛子筛去杂物，而后用手拨着粮食粒拣去沫草或石粒土块，拣好后小麦再用水淘，淘净晾干后再磨成面粉食用。

为保证粮食不被鼠吃，不落灰尘，多用粮屯囤起来。粮食屯早时有用秫秆皮编制的长条屯圈，也有用铁皮扣制的屯，屯底是用木板做的圆盘，周围钉的有木沿。到了70年代以后，人们用水泥预制大缸盛放粮食。80年代以后，用麻胶布袋装粮食，垛起来后再用塑料布裹起来。

盛用面粉时，为了保持卫生，新中国成立前后多用面坛（陶制），人口多的用

面缸（陶制上釉）存放，也有用木制的面斗柜存放，但以面坛、面缸为多。60年代起，多用各种废弃的盛装物品的圆桶存放面粉。

盛食品及食用的器具有锅、碗、瓢勺、筷子等，一般都是一顿饭一刷洗。每顿饭餐后，即用水刷洗锅、碗、筷，如果家里来了客人，会将刷洗过的碗筷再重新用热水冲洗一遍，以示对客人的尊敬。长葛一带新中国成立前后用陶制刷釉的碗盛饭，多为竹筷子。60年代以后用搪瓷铁碗，但仍以陶制刷釉的碗为主，80年代后有用塑料制的碗，也有用钧瓷碗，如今以搪瓷碗、塑料碗为主，竹筷子仍是主要用餐工具。这些器具除每顿饭刷洗一次外，逢年过节也会再冲洗一次。

四、灭鼠

老鼠是长葛一带危害人们身体健康，而且毁坏衣物、粮食的最大敌害。新中国成立前后，对于老鼠多的地方采取水灭的办法，其办法一是在水盆里盛上水，上边飘有食物，盆上边放一圆棍，当老鼠沿着圆木棍到盆里吃食物时，圆木棍滚动，老鼠掉在水里淹死。办法二是在大水缸里盛满水，水上撒满麦糠，缸中插一木棍，老鼠沿木棍下去采食时，跳在麦糠上落水。也有采取穴除的办法，即找着老鼠洞穴灌水，逼老鼠出洞打死。也有用砖土将鼠洞封死除之。但大多数农户是靠养猫除掉老鼠，有一猫管十家之说，即一只猫可以灭除十家的老鼠。

50年代以后开始用老鼠夹消灭老鼠为主，80年代长葛的老鼠药闻名全国，鼠药成了灭鼠的主要办法，但鼠药危害大，毒性强，常有人误食中毒。2003年国家对于毒鼠强进行了专项治理，长葛的鼠药生产厂家、销售窝点被依法打击，剧毒鼠药自此退出市场。在2003年的毒鼠强专项治理中，长葛共捣毁神猫化工有限公司、春阳化工厂、南席镇红星助剂厂等生产鼠药窝点3个、储存鼠药窝点2个，取缔无照经营鼠药摊点、窝点17个，查获剧毒鼠药1500多公斤，抓获犯罪嫌疑人5名，鼠药全部被无害化处理。

目前，农村仍以养猫除鼠为主。

第八节 民间医术

长葛一带的民间医术有针灸、拔火罐、推拿等。

针灸即用针扎患病的穴位，以此治病。这种医术多为祖传，也有跟别人拜师学技的。

拔火罐，是用火罐或大口瓶，燃上纸，猛扣在患病的穴位，借火罐内的吸劲吸出病毒去病。

推拿，主要用于治跌打损伤骨病，农村俗称为“捏先”。即摔伤或骨头脱臼，用手狠劲推捏，使伤骨重新接好，或使脱臼骨头回位，这种医术多为民间祖传，一般治疗跌打损伤，大的骨病还要到医院治疗。

膏药，民间治疮、腰腿痛病多用膏药，膏药多为祖传药方熬制，种类很多，名字也千奇百怪，但大都是以膏药的主要用料，或个人姓氏命名，如赵庄膏药、狗皮膏药等。

第九节 民间医生

长葛一带民间医生称为先生，先生们多为祖传，子承父业，也有投师学技的。有名望技术高的先生，一般都在家设有药房诊疗室，在家看病。有人请，也到病人家里看病，俗称“请先生”。然后随先生回家取药，危重病人，先生带有药箱，随即针灸或打针开小药箱取药让病人服用，这类药多为自己配制的丸药。一些医术不高的人，称为“野先”，这类先生，背着药箱，或者是小包袱，带着自制的药，针灸用的针，走街串巷叫喊。这些人喊叫的或者打的招牌都是治疗“疑难杂症”，如有人看病，就在大街上摆开摊，卖药针灸。还有一种在街头上并不叫喊，而是在地下铺一块白布，布上写明卖什么药或治什么病。如果是治牙的用瓶子装上几颗牙放在布上做幌子，起痣祛斑的则在布上画有人头像，头像的脸上长痣长斑，卖蚰子膏药的则用秫秆签扎个蚰子摆在摊上做幌子。

农村中叫魂不请先生，都是家中老年人叫魂。如果是在外边掉了魂，年老的长辈拿一把竹篮子，拿一件丢魂人穿的上衣找吓掉魂的地方，然后竹篮子放到地下，把衣服放在篮子上，边叫边走着回家：“××回家吧，××回家吧……”一直叫着走回家里。另一种叫法是小孩吓掉了魂，每天早上，中午、晚上三个时辰，在吃饭前由家中老人拿把盛饭用的勺子，磕着屋门的门头，边磕边叫：“勺子磕门头叫，××回来了，××回来吧！”反复多次，磕着叫喊，直到孩子惊吓的症状消失恢复正常后方止。

以前农村的接生婆，多为本村的老女人，或中年妇女，他们不需要培训，生的孩子多，有经验即可。到后来也就是70年代以后，才逐步由农村赤脚医生取代，但仍然有接生婆活动。

第九章 游乐民俗

第一节 游乐沿革

长葛一带的游乐活动，大都属于民间休闲娱乐锻炼强身的松散性活动。新中国成立前及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在闲暇时，自发性开展一些活动，没有组织，没有比赛，没有奖惩，只为求趣求乐而已。如踢毽子、跳绳、打抬、刀绞等，这一类都是小型活动。有一些规模比较大的活动，比如打秋千、斗鸡、斗鹤鹑一类的活动，也没有固定的组织，只是由一些热心人出面召集组织，或自备一些道具吸引大家参加，从中取乐。比如斗鹤鹑召集人要备下大簸箩供斗鹤鹑用，搭秋千要备下粗麻绳、长木棍等，活动时有人出面排个先后顺序，有争端主持公道。

20世纪60年代，民间小型的游戏活动虽然仍属自发性，但随着人们生活的改善提高，人们的游乐已开始有人出面组织。在节日里，一些大队、学校及一些社会团体，会组织跳绳、踢毽子、打篮球、拔河、象棋等比赛，并且发奖评先，有物质有荣誉奖励。在这个时期，由于人们文化生活的缺乏，游乐活动比较兴盛，每到农闲节假日，或晚上，各类活动比较活跃。

70年代，由于受社会背景的影响，再加上生产的繁忙，游乐活动减少，而且带有一定政治色彩。有一些被视为“四旧”而被禁止，如“麻将”“骨牌”均被禁止。只保留一些学校内适合少儿活动的跳绳、弹弹子，同时也新兴起一些新的活动项目，如摔面包、砸钢碗等，成年人的活动集体组织的项目多了，除打篮球外，也兴起乒乓球、羽毛球，除象棋外，也新兴起军棋、跳棋，打扑克也新兴起“人民战争”等，田间地头的活动，除了“摆方”、下“皮条”外，也有了摔跤比赛，但都是自发零散的娱乐活动。

80年代起，城镇单位由工会出面组织活动，农村则由团支部、民兵组织各式各样的活动。活动的时间大都在五一、春节，因十月一日正是农村种麦的紧张阶段，很难开展活动，妇女则在三八节开展跳绳、踢毽子比赛，但最多的比赛项目是篮球、乒乓球、羽毛球、拔河、象棋、军棋、跳棋、打扑克等。

进入21世纪，衣食住行条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娱乐休闲的方式有了很

大的选择性，游乐活动空前活跃。除自由散乱性的活动外，如下棋、打扑克，以及单位、集体组织的比赛性的活动外，如拔河、球赛外，民间自发地兴起了一些新的游乐组织，比如钓鱼协会，他们定期或不定期组织比赛活动，对于优胜者，发奖或物质奖励，奖鱼竿、鸟笼等，其资金来源均由民间自行筹措。政府也有文化部门负责民间游乐活动，使这些活动有章有度有序健康发展，避免赌钱、赌财物的违法现象发生。

第二节 游乐竞技种类及类型

游戏竞技的类型有成年人型、少儿型两大类，又分室内室外两种。

一、成年人型

成年人室内的游乐竞技的种类 有象棋、军棋、跳棋、麻将、骨牌、扑克等。象棋、军棋、跳棋都是全国统一的下法，骨牌在长葛一带仅有，即用竹批或木板，过去是用骨头刻成所以称骨牌，俗称揭鞞，多用竹批、木板、塑料等刻制成，版面上钻有圆眼，其名称有骡子（十二个眼）、花十（10个眼），眼的颜色有红、有黄，红十（10个圆眼的颜色即红6黑4）、墨十（10个圆眼全为黑色），另外还有人7、红8、黑8等，都是根据圆眼的颜色而说。四人揭牌数点，三人玩一牌。出牌的过程中，大点压小点，大对压小对，如果第一个起牌的人先发牌，牌好可以先发牌，牌不好叩牌。若先发牌不赢为抬头鞞，即一鞞。要是牌不好，会把牌翻着放下，谁的牌好谁揭，揭牌人如不赢为鞞，揭一次为一鞞，鞞要出鞞钱，四人都有。牌共24张，四个人数点，只有三个人干，数着谁干，但鞞钱当场四人均有一份。

打扑克，在长葛一带，过去是打百分，后来打人民战争，80年代打“五十K”，现在打“双升”“二七主”。后又兴起“斗地主”“挑红十”“推拖拉机”等，由原来的娱乐发展为赌博，被公安机关打击。

成年人户外活动 摆方。即在地上划五横五竖交织成正方形，在横竖交叉点摆子，两人用不同东西当子以便区分，大多就地取材，用小石头、干柴棒、树叶。一人先下子，另一人接着下，但规矩是先下后吃。游戏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摆，要想方设法获得奖励、多摆子，第二阶段为吃，要想方设法获得奖励、多吃掉对方的子，把对方的子全部吃完，游戏结束。游戏规则是摆成规定形状，可以奖励多下子或多吃子，规定形状有方、小斜、四斜、周、老通。方，即四子摆成方块，可多

摆一个子，或者第二阶段吃对方一个子。小斜，即三子相连与两条边成斜三角，可多摆一个子，或者第二阶段吃对方一个子。四斜，即四子相连与两条边成斜三角，可多摆两个子，或者第二阶段吃对方两个子。周，分边周、二周、中周，必须五子连成一条线，五子相连在边的称为边周（第一阶段可多摆一个子，或者第二阶段吃对方一个子），五子相连在第二条横线或竖线的称为二周（第一阶段可多摆两个子，或者第二阶段吃对方两个子），五子相连在中间的横线或竖线称为中周（第一阶段可多摆三个子，或者第二阶段吃对方三个子）。老通，即对角线五子相连，第一阶段可多摆三个子，或者第二阶段吃对方三个子。第一阶段摆满后，进入第二阶段，先各掐掉对方一个子，第一阶段后下子者先走。摆方是一种益智游戏，多在田间劳动休息，或者街头休息时玩耍，是男人或男童间的游戏，需要走一步看三步，否则一步走错，对方获得大的奖励，就会满盘皆输。因此，观看的人不能说话，更不能提醒一方，否则就会坏了人家的好事。

类似的游戏还有摆皮条，即在地上划四横四竖交织成正方形，游戏规则与摆方大致相同，吃子的办法有扛篮、挑担、顶吃、甩鞭等。

二、儿童游乐活动

投清官 多由十岁左右的儿童活动，其场地多在土路上，由四个人进行，每人脱掉一只鞋子，用土封住鞋跟立起来，一排三个，两边的叫打手，中间的那只鞋叫死妮子，死妮子后边再立一只鞋叫清官，对面五尺左右划一道杠，四人先在立鞋的这头往横杠那头投鞋，依据离杠的远近排出先投后投的顺序，离横最近的为第一个投，依次排出一二三四，四人用另一只鞋投清官，两边的打手容易投，如果投清官撞倒了死妮子，那就得撅起屁股趴在地下，投中打手的问投中清官的人：“投着容易挨打难，问清官加垫不加垫？”清官如果和投中死妮子的人关系好，就说：“加垫。”一个打手就拿鞋垫在死妮子屁股上，由另一名打手打，边打边说。如果打手和死妮子关系好，就直接说道：“过银桥，走金桥，问问清官饶不饶？”如果清官和死妮子关系好，就说：“饶！”打手就不再打了，进行下一盘。如果清官说不饶，那还得接着打，接着过，直到清官说饶再停止。要是打手和死妮子关系不好，会边打边说：“过金桥，走银桥，河湾里有只咕咕喵，咕咕喵水里逃，跑到岸上看见猫……”只要押韵可以无休止的说下去，死妮子就得继续挨打。

星星过纓 星星过纓，也叫星星过腰，是多个儿童同时参与的游戏，男童女童都可参加，一般在晚上进行。游戏人员分三类，一人为“老师傅”，一人为“瞎

子”，剩余的人为过客。游戏开始前，一群人先通过查数、挥手等游戏选出一名“老师傅”和一名“瞎子”，一般是游戏第一名当师傅，最后一名当瞎子，也有的是只选一名瞎子，老师傅由年龄稍大的人担任。“老师傅”坐着不动，负责捂着“瞎子”的眼睛，不让他看到过客的动作；“瞎子”负责猜测过客是谁、模仿的是什么动作或动物；过客负责模仿各种动作从“瞎子”眼前经过。过客模仿动作经过时，老师傅根据过客模仿的动作喊叫，挑担子的过去了（模仿的是挑担子的动作），骑马的过去了（模仿的是骑马的动作），牵牛的过去了（模仿的是牵牛的动作），推车的过去了（模仿的是推车的动作）等等，过客过完后，老师傅问瞎子，你要哪一个，瞎子任意说出一个，并猜测模仿人的名字，猜错的话继续当瞎子，游戏继续进行；猜对的话，被猜出的过客当瞎子，瞎子当过客，游戏继续进行。

打瞎驴 先推选一个瞎驴，一般都是年龄小，或者是女孩子，用手巾勒住眼，其他人围成圆圈，乱打乱抓来回推瞎驴，瞎驴根据打者所处的方位距离伸手去抓，如抓住打者，打者当瞎驴，抓不住继续被打被抓，直到抓住人为止。

藏老猫 即由几个孩子推选一个人，为寻找的人，叫树墩，其他人为藏猫的人。树墩被老师傅捂眼，其他人跑散藏起来，等藏好后，老师傅松开手，树墩寻找，找着谁谁当树墩继续进行。

打抬 划一根横线，两人各拿一根木棍，大压小，谁输谁放到地下，另一个人用木棍打放在地下的木棍，打过去，木棍属于自己，打不过去让对方打，谁打过去谁赢一根木棍。多为男孩子玩。

刁纠两个人各抬起一条腿抓住，去撞击对方，谁脚先沾地谁输，男女孩子都玩。

抓子 用砖头砸成小块，或者是用小石子，由两个女孩子玩，用五个子，先拼（bin）子，每人抓起五个子撂起再用手背接，谁接住的多谁当头起，先摆一个子（叫猴），抓起地下的四个子再接住撂起来的一个，如果抓不起来四个子或接不住撂起来的那个子，为败，让给人家抓。一次比赛叫“把儿”，第二步比赛“捻儿”，先撂起来一个子，然后抓三个，接住撂起来的子后，再抓起地下的那一个，如果接不住或抓不完子为败，另一个人接住从“捻儿”开始比赛。第三步是“对儿”，即先撂起来一个子，先抓两个接住子，再撂起来抓剩下的一对，如果不能完成即让给对方，对方也从“对儿”开始，如完成，接着是“条儿”，条儿是撂起“老猴儿”先抓一个，再撂起“老猴儿”抓三个，依此进行，谁先完成谁为赢。

踢毽儿 用布包起两个制钱缝成墩，再用鸡尾毛筒缝上，插上小鸡毛即成，多

为女孩玩，伸手找班，都伸手，手心为一班，手背为一班。然后伸指头大压小，比赛开始，踢法为逐个人踢，五下一落（即踢够五个，毬儿要落在脚面上），十下一吊（即把毬儿踢够十个，要把毬在背后踢到前面），败者为输，由一班的人接着踢，如再败则由对方踢。

跳绳 男女孩子都玩，有单跳、双跳。单跳是一个人抡绳一个人跳，双跳是两个人抡起绳子跳，有一个人跳，有双人跳，有一条腿跳，有两条腿跳，有立着跳，有蹲着跳，双人跳还两个交叉换位跳，先分班，以伸指头比大小，大先小后，先者跳后者抡绳，绳绊住脚为败，让给对方跳，各班跳的下数累计计算，谁跳的多谁赢。

在农村庙会上，还有“撂圈”“扎绳”“猜瓜籽”“打玻璃球”“摆棋阵”等营业性活动，这里边含有很大成分的骗术。也有一些带有体育性质的营业性活动，如“气枪打气球”等。

第三节 游戏竞技器具

有一些游戏竞技活动器具是由企业制作出售的，如象棋等。有些是民间个人制作，如骨牌，这是国家已明令禁止，活动者少，就由自己制作。多为竹竿板，不易碎，所以有“扳竹竿板”的俗语。后来用胶木制作，塑料板。

秋千不论是架子秋千或者是猴秋，由群众自己制作、搭建，或者购置一些必要用品，等过完元宵节，春节结束后再拆掉，各自收拾回自己家的东西。

儿童玩的器具，踢的毬子、沙包，均由自己或家人帮忙制作。只有下跳棋的弹子（玻璃球）、军棋等需购买。

斗鹌鹑的鹌鹑则由自己捕捉、驯养，也有从外地购买回来驯养教习，斗鸡用的鸡也是斗鸡人喂养，当鸡快养成或养成后，也有在同行爱好者中买卖的，选鸡苗、喂养、教习也是喂鸡人担当，狗多半是从外地购买，买回来的狗基本上就可以参加比赛。

第五编 文艺民俗

第一章 民间艺术

第一节 民间艺术的传承

长葛一带的民间艺术具有传统性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它所涵盖的内容有民间舞蹈、民间音乐、民间戏曲、民间曲艺、民间美术等。这些传统性的民间艺术活动，在明末清初处于鼎盛时期。据有关史料记载，传统的民间艺术活动多在年节、庙会期间举办，重大节日或大的庙会上还会举行比赛。清朝同治年间，长葛县城就举办过多次民间艺术表演、比赛活动，上百支表演队伍齐聚县城，有舞蹈、有说唱，吸引数十里的人前来观看，可以说是人山人海，挤扛不动。尤其是石固镇，南北寨四街均有狮子社、龙灯社。

民间艺术的表演团队多以“社”“会”命名，如“同乐社”“童灯会”等，都是民间组织，有的是以村成社，也有几个村或跨乡跨县组成社团的，如石固申庄的铜器社就由长葛、新郑、禹州几个县组成社团。其道具购置均由富户捐资或民间收取，参加活动的人是尽义务，不要报酬。有些社团也在春节期间向商贾、富户拜门收取礼金，以补支用。

新中国成立后，在各级文化部门组织下，除在古庙会活动外，还利用重大节日和丰收之后开展活动，有些大的企业开业庆典也邀请民间艺术团体助兴。

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民间艺术表演被视为“四旧”而被禁止，烧毁道具、批斗老艺人、解散社团。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民间艺术活动才逐步恢复，而且在文化部门的要求指导下，比以前有所扩大。自20世纪80年代末，民间艺术团队除在本村、本地表演外，每逢元宵节，县文化部门还组织民间艺术调演、展演比赛，统一指挥，分街定点，固定团队表演路线，县文化部门组织的评委按标准打

分，表优奖先。

到20世纪90年代，县文化部门对民舞、民乐开展普查，抢救保护濒临灭绝的项目，使民间文艺活动持续发展。同时民间艺术团队的活动进入平民百姓的生活中，婚丧嫁娶，要请民乐队、腰鼓队、盘鼓队表演；商店企业开业，要请盘鼓队、狮子、龙灯在大街巡游作广告，过去纯粹农民自娱自乐的活动性质步入商业操作，而且形势、规模、艺术品种都较之过去有很大的发展，艺术技巧也不断增加新的内容使之更加完美。

第二节 民间艺术的种类

长葛的民间艺术名目繁多，源远流长。诸如门画、壁画、泥塑、石刻、纸扎、烟花、鞭炮、唢呐、篾篾等，多是祖传绝技，驰名乡里。舞蹈则有狮子、龙灯、竹马、旱船、抬阁、肘阁、小车、高跷、独杆桥、毗牙官、扯犟驴、二鬼摔跤、跳假神、老背少、莲花灯、铜器舞、大头和尚戏柳翠等。新中国建立前后，解放军又带来了腰鼓舞、秧歌舞、打花棒等。

抬毗牙官

靳全州

我的家乡“乐神”葛天氏的故里后河及长葛市周边一带，流传着一种独特的民间文艺“抬毗牙官”。它是一个参与表演的人数较少，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的十分搞笑的文艺活动。

葛天氏时期，人们在捕鱼、打猎获取胜利以后，大家为了庆祝胜利，往往会高兴地把有功人员围拢在中间，尤其是在特别兴奋时，甚至会由几个人把他共同托住撂起来，接住后，重新再撂起来，这样重复多次。被撂起来的人在空喜笑颜开，有时候还会在空中翻跟头，逗得众人大笑，这是该项活动的雏形。

后来这种活动大多在春节和灯节期间表演。它所使用的道具是这样的：是把一根四、五米长的圆木（独龙木）在三分之一处，砍一约十公分长、约两三公分深的弧形面，垂直固定在一根碗口粗、约两米长的圆木（也叫横梁）上。横梁的两端在一条线上各钉两个露头约十公分长，相距约十五公分的铁钉。横梁上的两个铁钉又卡在垂直的两根直径约十公分、长约一米七的圆木（也叫抬杠）中间。抬杠有四个

人抬。在独龙木的梢部，固定有一只小木箱（作为案桌），案桌后面固定有一把小靠椅。在独龙木的底部，横向垂直固定有一根一米长、直径约十多公分的操纵杆。

表演时，整个框架由四个人抬着。独龙木后部的操纵杆由两个强有力的人同时上下扳动，使独龙木的梢部上下忽起忽落。扮演吡牙官的演员，必须是身材瘦小，胆大而又机灵的人。演员身着戏剧官服，头戴官帽，面部化妆，带着稀疏的短胡须坐在小椅上，左手拿一把折叠扇（也叫合扇）。木箱上钉一个小圆钉，圆钉上用细绳子拴一块小木板作为惊堂木，在独龙木的起落中不时地拍在木箱上，同时还要发出“都——都”的怪叫声。并且还要不时地摇着扇子做出多种十分滑稽的动作，出尽洋相，以此引逗观众欢笑。

当时他们表演的有：“牙官跨街”、“吡牙官断案”、“吡牙官调戏妇女”（扮演者逗嫂嫂们）、“吡牙官玩官帽”（在买到官职后得意忘形，有的演员还带唱）等节目。我就看到过“吡牙官”断案、“李豁子”拦街离婚的表演。

这些优秀的民间文艺节目和独特的表演形式，鞭挞了历史上贪官污吏的丑恶嘴脸，也充分反映出农民在获得解放后过上美好、幸福生活时感情的释放，因此记忆犹深。

踩高跷

靳全州

关于高跷的起源，学者们多认为与原始氏族的图腾崇拜、与沿海渔民的捕鱼生活有关。据历史学家的考证，尧舜时代以鹤为图腾的丹朱氏族，他们在祭礼中要踩着高跷拟鹤跳舞（见孙作云《说丹朱》）；考古学家认为，甲骨文中已有近似踩跷起舞形象的字（方起东《甲骨文中商代舞蹈》），两者可互相印证。

任何艺术都源于自然和劳动中，踩高跷也是人类生产劳动过程中的产物。在我们家乡后河——乐神葛天氏故里有一种传说：在远古时期，葛天氏族为了用手摘到树上高处的果子，他们就把带叉的树枝绑在腿上，既增加了高度，又可以灵活地到处移动，大家看着好笑，后来就把它变成了一种娱乐形式。人类起源于劳动说，还可依据晋人郭璞的另一条注释：长臂国人在赤水之东，身体像常人，但臂长三丈，长脚人常负长臂人入海中捕鱼。由此可以联想到，脚长是绑扎着木跷，手长是手中拿着长木制作的捕鱼工具，他所描绘的酷似现今居住在广西防城“京族三岛”的京族民。在寒冷季节捕鱼，为避免海水弄湿衣裤而踩着木跷在浅海中撒网

捕鱼的形象。另据《艺风》杂志记载：武昌的筷子街和箍笼街，因地位低湿而常被水淹，那里的人们每当水淹时，差不多都踩着高跷来往，这又是高跷源于劳动与生活的记载。

高跷本属我国古代百戏之一，早在春秋时已经出现。我国最早介绍高跷的是《列子·说符》篇：“宋有兰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见其技。以双枝长倍其身，属其胫，并趋并驰，弄七剑跌而跃之，五剑常在空中，元君大惊，立赐金帛。”从文中可知，早在公元前五百多年，高跷就已流行。表演者不但以长木缚于足行走，还能跳跃和舞剑。

高跷分高跷、中跷和跑跷三种，最高者一丈多。高跷道具的制作最为简单，一般用四至六尺长的条木制成，有的则有丈余。在距离顶端约一尺二寸处有一木托，演员将双脚分别踏在木托上，把双腿用布带绑在木棍上，化妆成各种人物，一人或多人来往逗舞，由锣鼓和民乐伴奏，表演出有趣的动作或故事，北京称为“高跷会”，黄河流域则称“踩高跷”，且有文跷和武跷之分。文跷演员主要表演走唱，有简单的舞蹈动作；武跷演员踩低跷则能表演倒立、跳高桌、叠罗汉、劈叉等较难的动作。

每到农历正月，一队队高跷队，在腰鼓、小钹锣、大小钗等打击乐中穿街而过。人数不定，一般十几人。低跷走在前面，高跷走在后面，演员均是传统戏装打扮。高跷的队列在街头行进中，一般采用一字长蛇阵的单列，在繁华拥挤地段采用双人并列队形，步子变换为走八字。表演有“小旋风”“花膀子”“鹞子翻身”“大劈叉”等难险动作。高跷表演常常在农村冬闲时，农民自发有组织地进行排练。

武高跷，头跷为指挥，二跷是领队，戏曲人物居中，最后由丑汉压阵。表演首先变换各种队形扭动，然后表演“过仙桥”“跳桌子”“跳双凳”“大劈叉”等各种难度较大的动作。有的还表演“蹲走”“跳桌子”“鹞子翻身”“越头跳”“后滚翻”“单腿跳”等技巧动作。

这些高跷的表演时间，一般都在农历正月十五左右闹“元宵”期间，高跷是整个活动中的一种表演形式。因为它机动性大，行动比较自如，所以可以在大广场中表演，也可走街串巷。

踩高跷这种民间文艺表演，深受群众欢迎。五十年代初还能看到，“文革”以后，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销声匿迹了。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各种民间文艺又萌发青春，踩高跷的表演又出现在了喜庆节日的活动之中。

划旱船

靳全州

划旱船又叫“采莲船”，是中原传统的民间文艺。在家乡乐神葛天氏故里后河，更为流行。他们通常由四至六只旱船和竹马队分别组成方阵，各自一边，显现出水陆并行而配合演出。旱船演员化妆后手执划板，竹马演员化妆后跨在马上和旱船一对一配合，各自变换队形，随着由锣鼓点伴奏而表演。

划船表演的内容一般是戏曲唱词，但也有他们自编的。女性演员身穿红绿衣，渔家女装束，由一位老艄公手执划板带队。在表演时，按照戏剧表演的走路队形不断变换。老艄公头戴草帽，拿着划板腾挪闪耀，舞桨抖须；撑船（采莲）女步履轻盈，在布幔的掩遮下船身晃动，宛如行在水中。旱船演员由一马童带队，马童不时地在岸上向撑船女嬉戏或挑逗；而撑船女则不断地作出向岸上用划板拍水的动作，那马童脚下被水溅得十分湿滑，故而做出翻转腾挪的滑稽动作。整个耍旱船分两部分：前半部分即如上述，穿插进行舞蹈。后半部分进入高潮，彩船一字排成临岸停泊状，而岸上的马童做调戏动作，老艄公愤怒地和撑船女与马童展开搏斗。竹马演员则奔跑助威，最终马童被老艄公打翻在地，竹马队逃跑，旱船队兴高采烈地庆祝胜利而结束。

旱船的制作比较简单：船板周边是用小竹子或竹批扎成，中间有两根横撑，四周分布有六根斜立撑，上边扎圆形船顶固定在斜撑之上，然后用布做一彩色伞形船顶，船板用彩色纸糊上，中间留一个能钻进人的洞。船体四周用黄色绸缎幔起来，布幔下半部分画上水的波浪和莲花、莲叶，在水波下面还画有鱼、鳖、虾、蟹、蚌等，演出富有乡土气息，真实感人。

中原的划旱船表演，一般是在节庆之日（特别在春节、元宵节），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们在表演时的唱词也在不断地变换内容，现代歌舞也融进了古老的文艺之中，这正是对葛天文化的光大与传承。

推小车

靳全州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中下游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的主要

发祥地之一。在葛天氏故里的长葛市后河镇，各种各样的民间文艺活动历史源远流长，“推小车”就是其中的一支奇葩。

“推小车”的表演道具比较简单，由两个人表演。小车是用高粱秆或干桐木隼扎成框架，上面和两边用黄布蒙上，在前边两旁靠下画上黑色车轮，上面中间挖一个圆洞，扮演老太太的演员，上身需要穿上用蓝布特制的道具服装。其上衣下边用破棉花或稻草扎制两条小脚老婆腿，系在演员的腰前，因为有大蓝布衫罩着，酷似老婆盘腿坐在小车上边。其实扮演老婆的演员站在中间配合推小车的老翁进行表演。其表演逼真、幽默、滑稽，是一种喜闻乐见的民间文艺活动。

“推小车”的表演，往往会同“竹马”、“旱船”、“腰鼓”、“肘阁”等，组成庞大的演出阵容，在春节、元宵节前后或重大节日时进行演出，有时候也专门在欢闹的人群围成圈后单独表演。在表演时，两个男演员要化妆成一对老夫妻，老汉头系白毛巾，带着假胡须，肩上搭着小车祥架着小车，老婆头戴绒帽，帽檐两鬓旁插两朵大红花，两只由道具制作的“三寸小金莲”盘腿坐在小车上，左手按着一个小包袱，右手拿一把折扇，上衣内肩上挎条布带，布带两头系在小车的两梯上架住小车，两人脚步相互配合一致（实际上是由两个人抬着小车），做出行走、上坡、下坡、拐弯、侧歪、颠簸等一系列仿真动作，老汉还不时地做出气喘吁吁吹胡子的滑稽表情，老婆也好似真的坐在小车上，故意表现出卖弄风情的挑逗。

两个演员在表演时还有唱词，基本上用豫剧、曲剧等地方戏唱腔。以前的唱段有“走亲”“逃荒”“赶会”等；后来新增了“进城”“游玩观景”等新颖节目。他们的唱词由演员随意编唱，一旁有唢呐、笙、铜锣、节梆伴奏。譬如：（男唱）“老汉今年我五十多，俺的老婆我推着。（女唱）你不推我谁推我？如果别人要推我——（男问）咋着？（女唱）你肯定要——（男问）咋着？（女唱时并用折扇指着老汉的鼻子）把那醋来喝！”逗得观众前仰后合，捧腹大笑！

这种民间文艺的表演方式，现在已经很少见到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交通工具的更新，在现在的戏曲或影视剧中，已经出现了以自行车、摩托车、轿车等现代化代步工具充实剧情，真实地表现生活。但是，通过古老的“推小车”表演，则能够充分地表达人物的内心世界，它能够利用幽默、搞笑的表演，来讽刺鞭挞封建社会民不聊生，背井离乡的穷困生活，同时也能够体现出相互关心，结伴到老，永不分离等和睦的夫妻关系，以及劳苦大众对幸福生活的盼望和向往！

第三节 民间音乐

自古至今，长葛境内广为流传的民间音乐有民间打击乐器和民间唢呐音乐。这些民间音乐过去常在婚嫁、丧葬等民俗活动中和古庙会的祭神送鬼等迷信活动中出现。新中国成立后，在文化部门的指导下，每当节日盛会，城乡皆可听到高亢激昂的铙钹锣鼓声和清脆悦耳的唢呐鸣奏，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长葛的民间唢呐音乐，是以唢呐为主、笙做伴奏的中国古乐，俗称“响器”。新中国成立前民乐艺人被歧视，社会地位低贱，生活贫寒，他们的精湛演奏技能只是口传身教，没有文字记载，更谈不上树碑立传。民间音乐起源于何时，无法详细考证。据调查，清道光年间长葛县文胜班的乐队中就有唢呐伴奏。到民国初年，长葛县仅有3个唢呐班，16名艺人。这些民间唢呐班常用于婚丧嫁娶及庙会活动。当时的名艺人有陈白化、朱木妮、赵安营等。他们演奏的曲牌有《双蝶翠》《柳叶筋》《菠菜叶》《翻四调》《老八板》《小开门》《大红弦》《哭皇天》《山坡羊》《狗撕咬》等。新中国成立后，长葛的民间唢呐音乐班有董村、石象、南席、辛庄、刘村、老城等38名艺人。其中陈大法、毕丙信、朱森、李升、翟水全为最出名，其代表曲目有“云里游”“二黄帽”“打棒槌”“互相配”等。

1983年3月，县文化部门对民乐艺人进行登记时，已发展到18班，149人。7月15日，县文化局、公安局、物价局、工商局联合发出了《关于民乐管理的报告》，制订了民乐管理条例。9月召开了民乐艺人代表大会。

1984年成立了长葛县民乐协会，民乐协会办公室设在文化馆。

1985年，全县民乐班发展到26班，艺人226人。8人参加许昌地区首届民乐汇演，并获集体二等奖。

1986年至1987年灯节有24个民乐班在县城表演。到2018年，已发展有民乐100多班，从业艺人有1000多名。

第四节 民间舞蹈

一、狮子舞

此舞遍及全县。它既能表现雄狮的勇猛性格，又能表现狮子的温顺神态。狮子



狮子舞

高跷、抬阁、肘阁、推小车等配套节目。

为庆祝新中国的成立，全县各民间艺术社团曾一度活跃在大街小巷与乡村庙会。“文革”时以破“四旧”为名器具被彻底砸烂，停止了活动。1978年起，长葛的民间艺术社团如雨后春笋茁壮成长，重新活跃起来。截止1987年底全县有9个社团，20架狮子，随狮子舞表演的民间艺术30多个品种、演员千人以上。



肘阁

舞在长葛县源于何时，文字无考，据传始于康熙年间，开始的狮子皮不是犀牛皮，而是用牛、羊皮制成。狮子头是用纸浆模仿狮子头制成。道具是枪、刀、剑、戟，伴奏有鼓、锣、大钹、小钹。每开始表演，先到庙前进行祭奠。人们把狮子当作吉祥物。狮子到谁家拜一拜门就表示一年万事如意，现仍沿用。

同治年间社团逐渐增加，队伍逐步扩大。狮子社团开始有了竹马、旱船、



高跷

狮舞表演节目有：狮子沿绳、钻铡、攀高架、窜椅子，青龙盘狮，跳跃翻腾，广大群众喜闻乐见。

石固镇民间艺术团，新中国成立后积极配合党的工作中心，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宣传发动，在重大节日和大型会议期间，能够无代价地进行表演，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方向，起到了推动作用。1979年在县城表演时，被河南省电视台录像播放。1981年中央电视台播放在石固拍摄“农家乐”专题。

二、铜器舞

大铜器有大钹大铙，用弓子锣鼓点缀，整个乐队边演奏、边起舞，场面生动活泼。此舞是石固镇沈庄村于20世纪40年代将其发展而成的。沈庄农民沈胜炎生于1918年，小时跟长辈学会打《三边锤》《凤凰三点头》《倒上轿》和小铜器《十样锦》等锣鼓。1943年和一帮年轻人打大鼓、大铙、大钹时，心情欢乐，手舞足蹈，把几种锣鼓糅合提炼为新的锣鼓经。锣鼓也发展为肘子锣、肘子鼓、小锣、小钹等数十对，组成数百人参加的大型打击乐队。演奏时边打边舞，规模宏大，气势磅礴，雄浑激越，振奋人心。

此舞1987年被河南省《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录编，并编入《中国民间舞蹈集成》（许昌市卷）。

三、莲花灯舞

长葛的莲花灯舞，只舞不唱，属跳灯舞。它是长葛人民创造的优秀民间艺术珍品。



莲花灯舞

莲花灯舞始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创始人是长葛县城内的刘盘石。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由张喜等人出面成立了长葛县童灯会。加锣鼓伴奏而形成莲花灯舞，演员为数十名十二三岁的少男少女，头勒莲花巾，上插嵌水银镜的面花，身着和尚领、镶边素衣，下穿灯笼裤，足登绣花缀缨快靴，腰系彩绸，手端纸糊荷花

灯两盏，跟着执旗领队人，踏着《十样锦》的锣鼓点，节奏明快，动作轻盈，动有规律，静有图样，舞姿优美，创始至今，经久不衰。

莲花灯舞在长葛县老城一带，除每年灯节举行隆重的莲花灯会活动外，还经常应邀在乡村古庙会演出，深受广大群众喜爱。

1966年，因破“四旧”，长葛县童灯会的莲花灯舞停止了活动。

1985年，在国家收集普查与整理民间舞蹈集成工作中，长葛县文化馆专业人员，在各级领导的支持和群众的帮助下抢救复生了莲花灯舞。

此舞蹈1987年被河南省《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录编，并编入《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许昌市卷）。

第五节 民间杂技

杂技，来源于民间，是从劳动人民的生活与生产实践中创造出来的表演艺术。

明清两代，长葛乡间庙会上便有民间杂技、刀山班、马戏团、魔术队、武术队等进行卖艺活动。清末、民初，长葛县九牛站“翟老妖”，大名翟万里，因家贫流落他乡，以玩皮影，带些杂耍、小魔术等在庙会上活动。民国初期，翟老妖跟随开封杂技团著名演员“一撮毛”学艺，后于河北杂技队跑业务。原班主去世后，“翟老妖”带领全部人员回乡，在官亭乡九牛站村组建了长葛县九牛站刀山班。1930年间发展为马戏团。“翟老妖”带领全团人马南下，从南阳进入大别山一带演出。新中国成立前后在广西、广东一带活动。

1954年，表演团体登记时，翟老妖带领人员从海南岛回到长葛，与县政府文教科联系，在本县登记正式建立了长葛县杂技团，团长翟老妖，行政归属文教科，经济性质自负盈亏，实行分账分红制，共有演职员42人。建团后在老城朱家胡同进行了首场演出，得到了领导和群众的好评。自此，长葛县杂技团作为正式艺术表演团体，以惊险动人的艺术风格，活动于乡村庙会及重大节日期间。并经常到新郑、密县、郑州、洛阳、许昌、漯河、南阳等地演出。

1958年县政府派刘根成任杂技团政治指导员。

1964年7月长葛县杂技团建立党支部，鲁振民任支部书记，宋国恩任业务团长，共有演职员37人，属全民事业单位，经济自负盈亏，废除分账分红制，使用文艺级别工资制。主要演员有宋国恩、崔待均、赵晨义、翟爱云、翟全欣、翟文学、楚秀兰、楚秀菊、楚秀云等。

长葛县杂技团的主要节目有咬花、蹬车、爬竿、顶碗、顶桌子、走钢丝、椅子顶、飞叉、钻圈、空中吊环及魔术、杂耍等四十多个，伴奏乐器有管乐、弦乐和打击乐。

1966年长葛县杂技团与豫剧团、文化馆宣传队合并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1967年底根据河南省一县一团制的精神，杂技团被撤销。

1969 年长葛县杂技团恢复，并建立了长葛县杂技团革命委员会。主任谷俊昭。1970 年由许昌地区研究决定将长葛县杂技团交给漯河市。

第六节 民间戏曲

明清两代长葛乡村中便有唱河南讴之龙虎班及摆摊清唱的锣鼓会。早在清道光十年（1830），长葛县田赋吏辛克恒创办了长葛县第一个由戏曲艺人组成的专业梆剧演出团体——文胜班。到民国初年，长葛县又相继组成了班里戏、房里戏、越调戏，班里戏又名太平班，也叫八班戏，属衙内班房倡办；房里戏又名文胜班，属田赋税银征收处所办；越调戏又名同乐社，由工商界倡办。此后，长葛县又建立了南席金堂社豫剧科班、石固南寨西街曾聘豫剧科班、石固南寨东街李应田豫剧科班等。

新中国成立后，在 1952 年原文胜班的基础上组织建立了长葛县豫剧团。业余剧团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村村办剧团，乡乡成大戏，搭起舞台，拉来帷幕，自编自演，自娱自乐。到 1957 年全县先后建起业余剧团 44 个，1966 年以“破四旧”之名，砸毁了戏曲服装道具，农村业余剧团解散停演。

1978 年全县农村先后恢复组建了豫剧、曲剧、越调等 19 个业余剧团。随着电影、电视的普及、歌舞的兴起，截至 1987 年底全县业余剧团从高峰时的 44 个降到了 3 个。

长葛县流传的主要剧种有豫剧、曲剧、越调等。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戏曲艺术的交流，样板戏的普及，从外地引进有京剧、话剧、歌剧、二夹弦、道情等新的剧种。但仍以豫剧、曲剧、越调为主要流传剧种。

豫剧 豫剧，也叫“河南梆子”“河南高调”。“梆剧”发源于郑卫之乡，所谓“溱洧靡靡之音”一说，长葛县实系梆剧发源地之一。此可说明豫剧在长葛的流行，已有相当长的历史。

长葛县文胜班自创建一直沿用“四生、四旦、四花脸、八个场面、两箱管”之常习；所谓八场面：即鼓板、大锣、二锣、手钹、二弦、月琴、三弦、梆子等八手，此乃梆子班中乐队的通常组织形式。1935 年“板胡”即“瓢”加入了乐队成为豫剧音乐的主奏，1944 年“二胡”又加入了乐队，进一步丰富了长葛县豫剧音乐的色彩。

长葛县豫剧团唱腔同属板腔体，常用板式有慢板、二八、流水、飞板。在这四种板腔的基础上发展为四十余种板式。据调查在长葛流传的豫剧唱腔流派 30 年代前

大都用豫东调、祥符调、沙河调。30年代流散艺人增多，豫西调随其艺人渗入，40年代豫东、豫西、祥符、沙河四个流派在长葛共存。50年代长葛县豫剧团著名演员雷艳凤、王玉梅、李双成、吕兴旺、赵顺公都系豫东、豫西兼用之，成为两种流派的统一者，为此，长葛县豫剧唱腔的流派为豫东、豫西共存。



豫剧

民国初年，有“班里戏”“房里戏”两个豫剧戏班。“班里戏”又叫“八班戏”，为县衙班房所办；“房里戏”又名“文胜班”，为田赋税银征收处所办。戏班由班主一人掌管，收入分配实行分账制，20%归主演、乐师，80%为全体人员伙食。生活艰苦且不安定，演员社会地位低下。民国19年（1930），“班里戏”解散。民国23年，中牟县白金玉所领的科班戏在长葛演出，因收入不好，无法归家，被县城西关绅士李五收留，又增招部分少年，聘请魏海潮等5名教师，成立科班“万乐社”，群众称为“小孩戏”。民国31年荒灾解散。

1952年，工商界在“文胜班”的基础上，成立豫剧团，主要演员李玉琴、李月妞、孙美亭（孙淘气）、杨丰书（鳖妞）、李世卿、赵顺公等均有较高的艺术造诣。1954年定名为长葛县大众豫剧团。1955年底，与原洧川县工农豫剧团合并为长葛县豫剧团，实行统一领导，分团活动，统一核算，评分分红。1961年精简机构，改两团为一团一校。1963年8月，团、校合并，纳入全民所有，评定国家文艺级别，但因地方财政困难，仍坚持自负盈亏。1965年改为长葛县文工团，停演传统节目，编为两个“乌兰牧骑队”，巡回农村，实行派演。1966年，豫剧团与杂技团、文化馆宣传队共120人，合编为长葛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配合“文化大革命”演出歌舞和小演唱。1972年正式定为全民所有制单位，1974年复名长葛县豫剧团。1979年实行自负盈亏，定额补贴。1984年进行体制改革，实行团长负责制。

活跃在外地豫剧舞台上的长葛籍演员为数甚多。民国时期有毛兰花，嗓音高亢，表演细腻，14岁即名噪省城，居豫剧“十八兰”之首。红生李瑶卿曾为开封豫

剧团的主角。新中国成立后，净角演员吕兴旺，曾为许昌地区豫剧团的主要演员，他在《下陈州》中饰演包拯，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安阳市豫剧团团长张宝英，1959年拜师崔兰田，成为崔派艺术的主要传人，她主演的《秦香莲》，于1979年由香港金马影业公司与河南演出公司合拍为电影《包青天》，1985年12月她又主演《秦香莲后传》，参加河南省首届戏剧大赛，获一等演员奖。他专攻闺旦、青衣，长于悲剧，以唱取胜，嗓音清亮甘美，吐字清晰圆润，演唱情真味浓，浑厚深沉，表演含蓄蕴藉，自然得体，舆论界称赞她具有“常香玉的劲，马金凤的字，崔兰田的味”。其代表剧目有《桃花庵》《秦香莲》《卖苗郎》《洪湖赤卫队》《红云岗》。中国唱片出版社出版了《张宝英唱腔选萃》，上海音像制品公司出版了《张宝英唱腔精选》。她还是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安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安阳市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河南分会理事。河北省邢台市豫剧团团长靳晓飞，平顶山市豫剧团团长薛兰芳，博爱县豫剧团团长李志军，禹县豫剧团团长王金楼等也都有较高造诣。此外，省豫剧院著名演员唐喜成、高兴旺，著名丑角牛得草，虽非长葛籍人，却都出身于长葛科班。

曲剧 也叫“河南曲子戏”。长葛曲剧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没有文武场面，只是由演员自己拍板“哼曲儿”。以后出现了坐唱的“锣鼓会”。伴奏只有一把坠胡，一把四股弦。调门有阳调、扭丝、诗篇、书韵、剪剪花、垛子、满舟、嘹子等。40年代以来搬上舞台。伴奏乐器增加了二胡、三弦、唢呐、笙，并有锣鼓经。

新中国成立前后，长葛著名曲剧艺人赵德禄、毕虎臣、孙振卿等在长葛县石固、坡胡、后河、增福庙等地组织业余演出，其主要剧目有《赵氏孤儿》《淘气赶脚》《花庭会》等。50年代初，县境中部和西部部分村庄，成立有业余剧团，以后河村曲剧团最有名，传戏教师为赵德禄，每逢年节庙会搭台演出传统剧目。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坡胡公社又以石料厂为基础成立曲剧团，和禹县一些老演员结班演出，持续到1963年停止。“文化大革命”中，服装道具俱毁。

1949年到1975年间长葛县民间曲剧团有石固南寨东街曲剧团、坡胡辛庄坡曲剧团、后河曲剧团、和尚桥关庄曲剧团、古桥贾集曲剧团、石固岗李曲剧团等。

1978年11月，在县文化馆文艺宣传队的基础上，成立长葛县曲剧团，演职员28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排演的现代戏《于无声处》受到好评。以后演员增加到45人，相继排演了《卷席筒》《李天保吊孝》《柜中缘》《七仙女送子》《窦娥冤》《乔老爷上轿》《屠夫状元》等剧目，在安徽、江苏、河南各地演出，颇受欢迎。河南人民广播电台录放了《七仙女送子》选场。1982年收归县文化局领导。

长葛县曲剧团成立以后，学习继承了曲剧的传统唱腔，并不断丰富和革新，经常派演员到郑州、许昌等地学习，尤其在郑州市曲剧团著名曲剧演员韩永卿（长葛籍）老师的亲授下，使长葛曲剧团的唱腔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越调 越调戏在明末清初由湖北北部和河南南部流入长葛，唱词为长短句，采用一部分昆曲曲牌，伴奏乐器以四股弦为主，兼用月琴、三弦等。

据调查早在清光绪末年长葛县的越调戏以坐唱“锣鼓会”的形式出现，逢年节庙会，约一帮戏友，凑在一起唱着玩，不搭舞台，称为半台越调或地摊戏。到民国初年，长葛县由工商界组织倡办了越调戏班，名同乐社，著名演员刘莲蓬、张桂兰曾为该班主演。

新中国成立前，长葛县工商界办的越调戏解散后，石固镇牛家大户出高价，请名角组织建立了越调戏，称为牛家戏。

新中国成立后，长葛石象、小许、侯庄、张固店、榆林、王买、范庄等也先后建立了越调戏班。演出剧目主要有：《铡西宫》《李双喜讨饭》《刘公案》《穆桂英挂帅》等。“文化大革命”中，全部解散。

1966年，越调戏也同其他剧种一样，因破四旧砸了道具，烧了箱，上述几个越调剧团被解散。1978年增福庙乡小许村老艺人丁聃，在村党支部的支持下，组织恢复了越调剧团。

坠子 坠子俗称说书，由主要伴奏乐器“坠胡”得名，县内流行甚广。清光绪年间，由张景臣（王皮庙村人）、申万升（老城镇人）、张广林（张刘寨人），从开封、原武、尉氏等地学来传入长葛，串村赶会，演愿书、唱神戏，一唱数日，甚受欢迎。1952年县文化馆组织全县流散坠子艺人，建立长葛县曲艺协会，选举孙瑞昌、赵雨林担任协会正、副主席，编为7个小组，分别在全县乡村演出。1954年，曲艺队伍扩大到60余人，增编为13个小组。1958年曲艺队撤销，大部分艺人返乡务农，孙瑞昌、赵雨林到县杂技团做勤杂工。1962年，恢复曲艺队和曲艺协会，李庭俊任协会主席，演员20余人，分组演出，自负盈亏。1963年至1965年曲艺队改为曲艺宣传队，演员16人，运用河南坠子、相声、双簧、大鼓书、三弦书、大调曲子、器乐合奏等多种曲艺形式，进行巡回演出。“文化大革命”中，曲艺队再次解散。1976年重新组织起长葛县曲艺队。是年11月，县文化馆举办曲艺学习班，招收学员60名，学期两个月，学习坠子演唱和音乐伴奏。结业后，编为6个组，在全县农村实习演出。经过实习，除选留胡润芝等优秀学生外，余者自谋职业。1982年胡润芝等4人考取河南省戏校曲艺班，1985年毕业归来，10月组建为自负盈亏的职

业曲艺团体——长葛县曲艺队，属县文化局领导，胡润芝任队长。胡润芝演唱技巧日臻成熟，她演唱的《寒窑问案》、《秦琼打擂》由河南广播电台连续播出，《闹店》由河南音响公司录成盒式磁带，向全国发行。胡被吸收为中华全国曲艺家协会会员。

戏曲传授：

科班 自明清两代戏曲艺术在长葛兴起，到民国初年的发展与繁荣，使一部分艺人流入当地，依靠大户、名人绅士举办了不少社团性的戏剧科班。

1931年长葛县后河村杨七少（杨佩璋之子杨廷勋，群众传说其为“引龙侯”，皆呼其为杨七少），在其东院之家祠内创办了长葛县第一个豫剧科班，名为“三清班”。

1934年，中牟白金玉领的科班在长葛演出，因收入不好，白金玉撇下一群小演员自己离开，一群孤儿无家可归，西关绅士李五把他们收留下来，又招收了部分儿童，在西关天爷庙内成立了第二个科班，名为“万乐社”，群众叫小孩戏。

自此，长葛县又先后建立了南席街金堂社豫剧科班、石固南寨曾聘豫剧科班、石固南寨李应田豫剧科班等。这几个科班先后培养了蜚声豫剧舞台的唐喜成、赵锡铭、高兴旺、牛得草、王金楼、李志军、靳晓飞、薛兰芳、白太平、朱贵昌、李连升等著名豫剧艺人。

戏曲学校 新中国成立后，为促进戏曲艺术的发展，活跃农村文化生活，在县委、政府领导的关怀下，从1959年到1979年二十年间，除培养随团学生50人外，先后开办长葛县戏曲学校四期，培养学生200多人。

第七节 民间曲艺

一、曲种

长葛县流传的主要曲种有道情、鼓儿词、河南坠子等。新中国成立后成立曲艺协会，组建曲艺队，促进了曲艺事业的繁荣。通过地区办曲艺培训班，部队文艺工作者转入地方各种渠道，引进山东快书、快板书、相声等新的曲种。但仍以鼓儿词、河南坠子为主要流传曲种。

道情 道情，又称渔鼓道情。这一曲种源于唐宋，盛于明清。民间谚语称谓：“云游的道童，劝善的道情。救世的真话，老子的道经。”据长葛县河南坠子艺人李

廷俊的启蒙老师——尉氏县南檀乡马村七十六岁的道情艺人张元德讲：早在清道光十七年（1837）前后，师爷江教才就常在长葛县南席、古桥、董村、石象、老城一带演唱道情。后于清咸丰年至同治初年（1860~1870）间，伯父张荣发亦曾在长葛县境内演唱道情。民国十九年（1930）张元德继承先辈之业，跟随扶沟县营郭街道情艺人马荣庆继续在长葛县各地演出道情。直到1985年张元德还曾在长葛县东演唱道情。

流传在长葛境内的道情书目有：《平北宋》（亦名大宋金鸪记）、《响马传》、《隋唐演义》、《包公案》、《碧月图》等长篇大书。小段子有《李新贵打花》《对绣鞋》《刘秀走南阳》《王林休妻》等。道情艺人唱喜书及愿书时，大都先唱几句吉祥话。如“天地全神皆欢喜，一年四季保安康；人畜兴旺年百载，今年定收万家粮”，然后唱个吉祥段就开场大书。道情艺人常唱的吉祥段子有《韩湘子度林英》《韩湘子出家》《韩湘子上寿》《八仙庆寿》《龙三姐拜寿》《满堂富贵》《孙宾看桃》《吉庆高照》《二郎救母》《沉香宝扇》《俞二姐求子》《庆春词》等。新中国成立后也根据政治任务编唱些新书。如《互助好》《卖余粮》《向阳花》《计划生育好处多》等。

长葛县境内演唱道情的艺人除不出家的正一道士外，新中国成立前还有一些身背挎篓、怀抱渔鼓，呼喊着：“老爷太太，您发发慈悲，可怜可怜俺们俩。我腿瘸他眼瞎，少吃缺穿没办法”的讨食之词行乞糊口。还有一些利用唱道情击渔鼓赶集上会招徕人的算命先生演唱道情。不过，这类艺人早在30年代就不多见了。后长葛虽有道情艺人演唱道情，但已无专业艺人从事此曲种，濒于失传。

鼓儿词 亦称大鼓书，是流行在长葛的主要曲种之一。

长葛境内流行的鼓儿词，以小鼓和犁铧片为主奏乐，击节演唱，一般不用丝弦伴奏。常演唱的书目有《大红袍》《小红袍》《大八义》《小八义》《包公案》《济公传》等长篇大书。有时也演唱些《小老鼠告状》《游武庙》之类的小段。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也常编一些《斗倒地主把身翻》《互助组好处多》《唱唱新的婚姻法》等新书目。鼓儿词有吟有颂，有说有唱。唱腔单调，主要依靠艺人根据所唱书目的故事情节、人物性格、特定环境口中变化出巧。

在长葛境内流行的鼓儿词，鼓点一般可分为：单板、摇板托板、五鼓二板、流水板等。由于师承关系不同，艺人演唱风格又各有千秋。流行在长葛县的鼓儿词演员以翦清杰为主。此曲种新中国成立后不断吸收其他说唱艺术所长，不断丰富、完善。

据老城内长葛县旧商业界知名人士贾子明讲，鼓儿词在长葛县演出时间最长。清光绪二十年（1894）前后，许昌县苏桥乡老官王村鼓儿词艺人王洪，就在长葛县的石固、老城、石象、南席等地演唱鼓儿词。

民国17年（1928），长葛老城尹家堂村的翦清杰，拜在王洪门下专学鼓儿词，翦出师后跟随王洪仍常在长葛县各地演出。1952年鼓儿词艺人翦清杰参加了长葛县文化馆组织的曲艺组，先后于1962年及1972年收蔡同刚、徐金岭为门徒。

鼓儿词流行在长葛，前有老艺人传授技艺，后有继承人承接发展，今虽无专业艺人演出，但节假喜庆之际业余文艺队伍仍偶有所见。

河南坠子 河南坠子，流行长葛有百年之久。据石固镇岗河村82岁的老艺人杨



河南坠子表演

宝玉、南席镇尹庄村77岁的老艺人尹有等介绍：长葛县大墙周乡王皮庙村张北（景臣）、老城镇老城内申升（万升）、增福庙乡张留寨村张林（老林）等三人先后在清光绪年间已将河南坠子从开封、原武、尉氏等地学来传入长葛。

河南坠子之主要伴奏乐器为坠琴，亦名坠子弦。系拉弦乐器，其音域宽广，音色悠扬动听，伴奏时多用顿弓、滑奏等奏法。

河南坠子初流入长葛时艺人多唱腔调抒情婉转的东路调。由于长葛县交通方便，经济繁荣，古庙会颇多，各地坠子艺人常云集于此切磋技艺。为此，河南坠子东、中、北三路流派唱腔在长葛县坠子艺人中常被融为一体，创唱新腔。新中国成立后，坠子艺人逐渐增多，各地著名坠子艺人在长葛传艺，

青年艺人不断吸收戏曲及其他剧种的精华，从而丰富发展了河南坠子的唱腔艺术，使河南坠子音乐在长葛有了较大的发展。

据坠子艺人尹有讲 河南坠子由张北带入长葛时，所用乐器为三弦、书鼓、筒板。后申升、张林从开封、尉氏回来后才逐渐改用坠琴、单钹、脚梆、筒板。

长葛坠子表演形式有四：一是一人手拉坠琴、足踩脚梆，自拉自唱；二是一人手拉坠琴、足踩脚梆，另一人手持筒板站立一旁说唱；三是一人手拉坠琴、足踩脚梆，另二人手持筒板或单板，对口演唱；四是以坠琴为主，配以二胡、扬琴、琵琶

等乐器组成小乐队，数人化妆演唱。唱词多以七字句、十字句为主，间有部分五字句。音乐唱腔有过板、引子、平腔、大小寒韵、五字嵌、非板、快扎板等。过板是起唱前的过门；引子是正书开始时的引句；平腔是坠子唱腔的基础，用来叙述事情。有快、中、慢三种速度；寒韵用以表达悲切痛苦之情；五字嵌、非板等均可穿插用于平腔之间；快扎板用于唱段的结束部分。

长葛坠子艺人常演的传统书目有《大红袍》《呼延庆打擂》《秦琼打擂》《包公案》《响马传》《刘公案》《粉妆楼》《雷宝同投亲》《王林休妻》《杨家将》，现代书目有《平原枪声》《播火记》《大刀记》《摘棉花》《山猫嘴说媒》《赵部长探亲》等百余个。书目大致可分为长、中、短三类，中、长篇书目大都有说有唱，以说表为主，短篇书目只唱不说。

长葛坠子艺人清末民初有张北、申升、张林等；新中国成立前后有孙瑞昌、常玉新、赵舜、胡青彬、王连卿、张金泉、张金水、尹水河、尹有、李廷俊、杨宝玉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长葛县形成了上百人的河南坠子队伍。河南坠子十大明星之一的胡润芝，就是这个时期成长起来的。

二、表演

曲艺表演是曲艺演员用自己的身、手及手中道具，在演出时辅助说唱以叙述故事景况、描摹环境气氛、刻画人物性格等。

据调查长葛曲艺表演形式有三：一、坐唱；二、站唱；三、群唱。

坐唱 新中国成立前流传至长葛境内的道情、坠子多为坐唱。如道情艺人张荣发、张元德在演唱时，都坐于凳上，左手抱渔鼓打筒板，右手扣鼓以击节，以说唱为主，辅之以眼神及面部肌肉的活动，传达感情，叙述故事，描摹环境，塑造人物。如坠子艺人申万升、张北、张光林等，于清之光绪年间将坠子带回长葛县境演唱时，亦都是坐于凳子上自弹三弦或自拉坠琴，脚踏木梆，伴奏击节，进行演唱。

站唱 新中国成立前流传在长葛境内的曲种，站唱者有鼓儿词、坠子。如鼓儿词艺人王洪、翦清杰师徒二人演唱时，左手夹持犁铧片（亦称鸳鸯板），右手执一带彩穗鼓槌，站在书鼓之前晃响犁铧片敲响书鼓以击节，以说唱为主，辅之以形体动作。据了解，他们的表演，除用眼神及面部表情外，亦常将手中之鼓槌幻化出各种兵刃或用物，采用小幅度的戏曲演员表演程式中的动作，配合说唱，叙述故事情节，刻画人物性格，交代矛盾冲突。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家对曲艺艺人的关怀和保护，坠子艺人逐渐增多，自拉自唱者渐少；一拉一唱，结伴演出者增多。更由于失

目人纷纷投入此行，失明人中只拉不唱者渐多。因此，也就将坠子表演艺术由坐唱而推向了站唱。坠子站唱的表演艺术特点是：一人坐于凳操坠琴，蹬脚梆以伴奏。一人执筒板立于操弦人之侧，晃动手中的筒板而说唱，亦是以说唱为主，辅之以面部表情及形体动作，跳进跳出角色，推进故事情节。据调查站唱形式系由鼓儿词艺人王洪起，此后坠子艺人才学用此法。

群唱 长葛曲艺群唱表演艺术形式的形成，始于粉碎“四人帮”后长葛县文艺宣传队排演坠子表演唱《剥画皮》及《华主席登上天安门》时，第一次运用此表演艺术形式。其特点是：以坠弦为主，配以二胡、三弦、横笛、洋琴等乐器组成的小乐队；演员统一化妆，统一服装，左手执筒板，用导演规定的同一形体动作唱表同一节目内容。

据调查，长葛县曲艺艺人所采用形体表演动作皆源于人民生活及戏曲演员形体表演程式。如鼓儿词艺人翦清杰、坠子艺人孙瑞昌、常玉新、李廷俊，坠子艺人胡润芝等都以说唱为主，凭借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观察，借助各式各样人物的形体动作，创造出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他们的表演动作，都是根据生活的真实加以艺术的夸张，做到做什么像什么。但他们也都十分重视向戏曲艺术表演学习，取其所长，有选择地将戏曲演员的“手、眼、身、法、步”拿来丰富自己的表演艺术，生发出曲艺表演艺术的骑马、坐轿、推车、划船等形体动作。如李廷俊、胡润芝等还能巧妙地将自己手中的筒板、折扇等器乐和道具，幻化成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笔、墨、信、柬、杯、盘、碗、筷，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纵横驰骋，运用自如。

三、演出团体

（一）长葛曲艺队 新中国成立后，长葛县曲艺事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1952年全县30多名流散艺人，在县文化馆的组织领导下，建立了长葛曲艺协会。民主选举产生了协会正副主席，并根据曲艺艺人的艺术水平、政治思想水平及组织领导能力，分别编委7个小组，活动在全县人民群众之中。这是长葛县曲艺队的雏形阶段。

1954~1958年，长葛、洧川合并后，曲艺队伍逐渐扩大。长葛县曲艺协会进行了改选，民主选举产生了曲艺协会主席孙瑞昌、副主席赵雨林。并组建了长葛县曲艺队，由孙瑞昌、赵雨林分队兼任正副队长。当时共有曲艺艺人六十余人，编为十三个小组，除演唱文化部门审检过的《海公云霞》《大红袍》《小红袍》《包公案》

之外，也演唱《斗倒地主把身翻》《互助组好处多》《唱唱新的婚姻法》等新书目。

1958年反右斗争结束后，长葛县曲艺队被指令解散，大部分曲艺艺人被遣返农村务农。河南坠子艺人孙瑞昌、赵雨林被分配到县杂技团工作。

1962年，恢复长葛曲艺协会，重组曲艺队。李延俊、翦清杰分别任正副主席，曲艺队共有演职员20余人，统一组织，分组演出，自负盈亏。收入不足以维持生活时，县政府给予适当补贴。

1976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坠子艺人李延俊得以平反，由其担任教师，由文化馆出面组织，举办了曲艺培训班，为发展长葛曲艺队奠定了基础。

1981年胡润芝、何建设、李风琴、许建伟四人考入河南省戏曲学校曲艺班，其余演员由于管理不当，时演时停，处于瘫痪状态。

1985年胡润芝等四人毕业返县。县委研究建立长葛县曲艺队，集体性质，经济自负盈亏，属文化局的二级机构，共有演职员9人，胡润芝任队长。

（二）长葛县文艺宣传队 1963年根据县委、县政府的指示，长葛县曲艺队改建为长葛县文艺宣传队。由文化馆干部周秀根兼任队长。演职员周立亭、张金泉、张营州、徐金岭、李小霞、张秀玲等七人，排练了河南坠子、大鼓书（鼓儿词）、相声、表演唱等节目，配合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全县巡回演出。

1965年文艺宣传队在原来基础上增添了在许昌地区戏校曲艺培训班毕业的刘书汉、王海军、周书敏、杨秀英、刘喜梅、高玉枝、杨玉仙等演员，扩大至16人。不仅能演唱河南坠子，还学会运用相声、双簧、大鼓书、三弦书、琴书、大调曲子、器乐演奏等多种曲艺形式进行演出，所需办公费、演职员工资、演出设备购置等均有地方财政筹资。

（三）长葛县轻骑队 1965年10月根据县委、县政府指示，长葛县文艺宣传队改为长葛县乌兰牧骑轻骑队。1965年，河南坠子艺人李延俊被打成“黑帮”，并遣往农村监管劳动改造。部分演员下放农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长葛县乌兰牧骑轻骑队停止活动。

“文化大革命”期间，长葛县乌兰牧骑轻骑队由长葛县毛泽东宣传队取而代之。

（四）长葛县青年曲艺队 长葛县曲艺学习班：1976年11月，县文化馆根据县委、县政府的指示，举办了长葛县第一届曲艺学习班。曲艺学习班面向长葛县城乡招收年满15~22周岁的男女青年60名，学期两个月。河南坠子艺人李廷贤、县文化馆文艺组长范鹤掌分别任河南坠子演唱及河南坠子音乐教师。结业时，学生分别